

邊緣的他者： 晚清巴色會傳教士黎力基的客家書寫

趙蕊娟*

摘要 近代來華傳教士對客家文化做出了重要研究，其影響不可忽視。在眾多的研究中，巴色會傳教士黎力基的客家書寫具有其獨特性。一方面，他和晚清來華傳教士一起參與相關討論，繼承了明清時期傳教士對中國社會的關注，從他者視角記錄和評價客家人及客家文化；另一方面，與多數同時代傳教士“美化”客家人的傾向不同，黎力基採取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獨特視角。雖然他認同“客家為中原正統”的通常理解，但更多是從經濟現實和整個社會層面理解客家文化特質和歷史處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論述在二十世紀初客家精英的身份建構運動中缺乏足夠的話語效用，而處於邊緣的地位。對黎力基的再發現，能夠揭示出西方傳教士客家書寫的內部多樣性，並為我們理解晚清族群關係提供了超越簡單二元對立的歷史本文。

關鍵詞 黎力基 巴色會 客家文化 地方社會 族群身份建構



* 趙蕊娟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助理教授（教學）

一、引題

近代來華傳教士對客家文化的討論是早期客家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持續引起學界關注。早在1933年，羅香林就注意到西人發表於《中日記錄與見聞》（*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另譯《中日釋疑》）、《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和《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等外文期刊的相關文章。¹目前，學界主要從整體討論和個案研究兩條脈絡討論傳教士的客家研究。就前者而言，除了羅香林外，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日本學者飯島典子。她詳細地梳理並分析自郭實獵（Karl Frederick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開始多位與客家關係密切的傳教士在華活動及相關著作，認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傳教士對客家人並沒有特別的禮讚，也不存在什麼偏見。”²林正慧和施添福分別在《全球客家研究》發文，集中討論傳教士在客家名稱歷史演變中的作用。前者重點關注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³後者認為傳教士經由對“Hakka·客家”源流、方言等社會文化特徵的深入研究和文字報導，不但將“Hakka·客家”的標記向西方世界傳播，也促使該標記逐漸被客家精英接受，作為自我認同意識的標籤。⁴周建新認為早期客家研究範式形成於十九世紀中後期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客籍人士、外國學者、傳教士為主體和以讚美頌揚為主基調的“美化”。⁵王東、楊揚也將傳教士的客家研究置於客家學的發展脈絡中評估其價值。⁶在對傳教士的個案研究中，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 1838–1908）⁷、畢安（Charles Piton, 1835–1905）和肯比爾（George Campbell, 1860–1927）最受重視。譚樹林認為這三位是在華西方傳教士中參與客家源

流問題討論熱潮的代表，細緻比較其觀點的異同，認為儘管傳教士因傳教之需而參與到客家歷史源流的論爭，但在客觀上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客家文化，從而推動了客家研究。⁸夏遠鳴分析了兩篇傳教士發表於《中國評論》的文章，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來的客家研究。⁹此外，還有聚焦於特定領域的研究，例如西方學者對太平天國的討論、客家方言研究等。¹⁰

綜上所述，客家研究領域已從多元視角對傳教士的客家書寫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為後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然而，學界對傳教士群體內部存在的認知差異及其形成機制尚未給予充分關注。首先，以黎力基為代表的關鍵人物及其著述在學術討論中缺席。儘管學者已關注巴色會傳教士在客家研究領域的貢獻，如譚樹林認為“西方最早研究客家問題的為瑞士巴色傳道會的傳教士”，但對於歐德理或別的巴色會傳教士可否被視為客家研究的先導存有爭論。¹¹歐德理於1867年發表《漢人客家民族志略》（*Ethnographic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1873年發表《客家歷史綱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被視為是其客家研究的代表作，得到普遍認可，也因此受到較多關注，不少專題性研究均聚焦於歐德理的作品。然而，也有學者主張最早來華的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 1819–1854）和黎力基（Rudolph Lechler, 1824–1908）是客家研究的先導。¹²前者撰有《洪秀全的異夢和廣西叛亂的起源》（*The Visions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中譯本名為《太平天國起義記》），而黎力基則於1860年出版《客家俗話馬太福音書》（*Das Evangelium Des Matthaeus im Volkdialekte der Hakka-Chinesen*），被視為“客家方言有聖經之始，”¹³也是最早出版的一部客家方言文獻。¹⁴除了時間上先於其他來華傳教士，韓、黎二人的研究成果也成為歐德理認識和研究客家問題的主要基礎。¹⁵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上

- 1 羅香林（1906–1978）：〈客家研究發端〉，載氏著：《客家研究導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 2 飯島典子著，羅鑫譯：《近代客家社會的形成：在“他稱”與“自稱”之間》（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5。
- 3 林正慧：〈華南客家形塑歷程之探究〉，《全球客家研究》，第1期（2013年11月），頁57–122。
- 4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年5月），頁1–114。
- 5 周建新：〈客家文化的研究歷程與理論範式〉，《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6期（2016年11月），頁82–83。
- 6 王東、楊揚：〈客家研究的知識譜系——從“地方性知識”到“客家學”〉，《史林》，第3期（2019年），頁117–32，頁220。王東的學生楊揚在其博士論文中專辟一章“西方傳教士的客家研究”，從西方視角討論客家研究，詳見楊揚：〈從“地方性知識”到“客家學”——晚清客家研究的歷程〉（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1年），頁66–105。
- 7 其他常見譯名還有歐德禮、哀德爾氏、艾德、愛特爾等；為行文統一，除了引文尊重原作者的譯名方式，本文採用“歐德理”。關於歐德理的近期研究，見簡宏逸：〈歐德理與他的傳教士民族志：客家研究的德意志起源〉，《全球客家研究》，第7期（2016年11月），頁1–40；簡宏逸：《製作客家人：十九世紀傳教士的客家民族志》（台北：城邦印書館，2018年）；楊揚：〈傳教士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歷史教學問題》，第2期（2021年），頁51–57、162。

- 8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學術研究》，第9期（2007年），頁39–45。
- 9 夏遠鳴：〈試評《中國評論》中兩篇關於客家源流的文章〉，《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9卷第12期（2011年12月），頁20–23。
- 10 專門討論西方學者對太平天國的研究，例如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25卷第6期（2005年12月）；達昕：〈巴色會視野中的太平天國與會黨〉，《清史研究》，第5期（2020年9月）；劉中國：〈洪仁玕、韓山文與中國第一部口述回憶錄〉，《南方論叢》，第1期（2008年3月）。此外，莊初升專門討論西人對客家方言的研究，肯定了這些方言文獻指引對研究百年來客家方言面貌和書寫傳統的價值，見莊初升：〈清末民初西洋人編寫的客家方言文獻〉，《語言研究》，第30卷第1期（2010年1月）。
- 11 相關討論可參見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頁67–68。
- 12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44。
- 13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史》（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183。
- 14 莊初升：〈清末民初西洋人編寫的客家方言文獻〉，頁95。
- 15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39–45。

述傳教士以不同方式參與了早期客家研究，但學界對同屬巴色會的黎力基關注度不高，明顯遜色於歐德理、畢安、肯比爾等人。從學術積累看，黎力基在華傳教長達半個世紀，其於 1878 年發表的《客家漢人》雖非最早的相關論述，但距其在客家地區開展傳教工作已逾二十年，田野積累可謂深厚。從影響力看，黎力基的著作未獲應有重視。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認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後《教務雜誌》亦常有關於客家問題的論文發表，“尤以肯比爾《客家源流和遷徙》一文為可寶貴。”¹⁶ 這種選擇性關注形成了反差：儘管傳教士基於自身在客家地區的傳教經驗，通過《教務雜誌》等媒介就客家源流、文化等議題展開討論和對話，但黎力基的論述卻一直處於邊緣的地位。而挖掘其背後的多種因素，重新審視黎力基早期客家書寫的成就，有助於澄清近代傳教士客家研究的發展脈絡。

現有研究中亟待深入探討的第二個關鍵問題，在於傳教士的客家書寫與華南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學界在評價十九世紀晚期傳教士的客家研究時，大多注意到“像多數歐美人士一樣，肯比爾對客家人也是抱有一種讚揚、褒獎的態度，”¹⁷ 或者“他們對客家人稱讚有加，給予了很高評價，動輒冠以‘最衛生’‘最優秀’‘最優美’等詞彙。”¹⁸ 然而，飯島典子的研究卻表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傳教士對客家人並無特別禮讚，亦無明顯偏見。這種評價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不同時代傳教士的客家論述為何會發生顯著轉變？這種轉變與中西歷史情境存在怎樣的互動關係？在此過程中，黎力基的客家是否有其特殊意義？本文通過文本比較與歷史語境分析，首先梳理黎力基客家書寫的背景及獨特性，其次考察傳教士文本與中西方社會之間的互動機制，最後探討這種互動如何形塑了西方對客家族群的認知和形象建構。

二、黎力基的客家研究

黎力基對中國及客家問題的關注與其傳教經歷密不可分。¹⁹ 他出生於 1824 年，原籍德意志韓德新根（Hunderingen），祖父和父親都是牧師。1844 年，黎力基入讀

16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 15。
17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 43。
18 周健新：〈客家文化的研究歷程與理論範式〉，頁 82。
19 關於黎力基在華傳教經歷，主要參考施拉德（Wilhelm Schlatter）著，施民澤德文譯英文，戴智民德文譯英文附錄一、二，周天和英文譯中文：《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香港：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2012 年）；鍾清源：〈黎牧師力基行述〉，《萬國公報》，第 69 期（1893 年），頁 12-15；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頁 79-81。

巴色宣教學院。1846 年，二十二歲的黎力基被差往中國。1847 年 3 月，他與來自瑞典的韓山明一同抵達香港，稍後即前往廣東尋找傳教機會。最初幾年，黎力基在汕頭潮語區，韓山明則以新安（轄今深圳、香港）及東江一帶客家人為對象。幾經挫折，華人信徒江覺仁開始到新安傳教，並於 1855 年 3 月成立李朗新堂，成為巴色會在內地的第一座禮拜堂。²⁰ 而此前一年，韓山明已於香港去世，深圳布吉和李朗的工作因此轉由黎力基和韋永福（Phillipp Winnes, 1824-1874）負責。1899 年，七十五歲的黎力基最終返回德意志。除了短暫回國之外，黎力基輾轉於廣東與香港的客家地區，傳教生涯超過半個世紀。

早在 1850 年代初期，黎力基開始學習客家語言，已關注中國古籍，曾給巴色差會寄出兩篇有關中國人類學和中國歷史的文章。²¹ 在華五十餘年，黎力基差不多每隔十二年才回國一次，1858 年、1872 年、1886 年以及 1899 年。黎力基每次回國都會進行演講，其中 1858 年因身體原因回國修養時，曾在巴色大學發表八篇演講。此後他牽差會命旅行丹麥、瑞典、芬蘭等國，演講四十次，將“經史子集”作為探討對象，以期溝通中西文明。1886 年，八篇演講被結集出版，直到今天該書仍對中國人的歷史、宗教、文化、國家以及人民和家庭生活有引導的價值。²²

除了將中華文明經典介紹給西方，黎力基對巴色會所在的華南客家地區也格外關注，相關成果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工具書。除了前文提及的《客家俗話馬太福音書》，黎力基先後編寫《中德客語字典》、《德文—福佬（潮州）字典》、《巴色會崇拜禮儀》等，都成為日後來華巴色會傳教士必用的參考書籍。第二類是黎力基對客家源流問題的討論，特別值得一提。其代表作是 1878 年發表於《教務雜誌》的〈客家漢人〉（The Hakka Chinese）一文。巴色差會在華南地區有兩個基本原則，即選擇偏僻村莊和通過華人傳道，²³ 因此黎力基的文章也並非來自浮光掠影式的遊歷，而是建立在長期與華南地方社會密切互動的基礎上。第三類是對華南客家社會風貌的觀察。由於工作需要，傳教士經常走訪不同傳教站，或到偏遠地方傳教。1876 年 4 月 1 日，黎力基從香港出發，訪問廣東境內的巴色會傳教站，並撰寫〈粵省巴色會傳教站訪問記〉（A Visit to Some of the Basel Mission Stations in Kwangtung Province）一文，記

20 湯泳詩：《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9 年），頁 17。
21 施拉德：《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頁 66。
22 施拉德：《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頁 82。關於黎力基對中國典籍的譯介問題，可參考王昱茜：〈德籍傳教士黎力基對中國典籍的接受、譯介與傳播〉，《西部學刊》，總第 187 期（2023 年 5 月下半月刊），頁 147-51。
23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頁 83-90。

錄此次經歷。次年又發表〈巴色會在李朗的發展歷程〉（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asel Mission Station at Lilong, in the South of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1884年，黎力基發表了〈從廣州到汕頭〉（From Canton to Swatow Overland）一文，詳細記錄沿途所觀所感。上述三篇文章都關注教會在廣東的發展情況，與黎力基長期負責巴色會在華發展的角色有關。1874年11月，黎力基在回國修養後重返香港，開始“總監督”職位的第三個任期，負責領導巴色會在中國的工作。²⁴ 1877年5月24日，他代表巴色會出席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中國基督教福音派全體差會代表大會。由於職務需要，他掌握巴色會在粵省的發展情況，包括傳教站、信徒資訊等。在實地訪問過程中，黎力基也留下了沿途自然與人文景觀的記述。隨著巴色會在1860年代之後以粵東北地區客家群體為重心，黎力基在粵省巡遊尤為關注東北部的客家地區。1876年，他從廣州出發，沿東江水路經惠州、河源前往粵東北的梅州地區。1884年，他繼續從梅州沿韓江南下，到汕頭地區。期間黎力基紀錄了長樂地區的貧窮，汕頭的豐富物產及地方大族械鬥，都是關於晚清華南地方社會的一手資料。

上述三類成果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黎力基對客家問題的關注。就本文主題而言，他發表於《教務雜誌》的〈客家漢人〉最具討論價值。該文問世於十九世紀後半的特殊時期——正值西方學界興起對客家歷史文化的討論熱潮之際，與歐德理、畢安、肯畢爾等人的著作一樣，代表了早期傳教士客家研究的成果。下文將以〈客家漢人〉為主要文本展開分析：首先梳理黎力基對客家源流、文化特質等核心問題的論述框架，其次通過比較其與同期傳教士研究的異同，揭示黎力基論述的獨特性，最後結合十九世紀下半葉中西社會文化語境，評估該文在早期客家研究中的地位與價值。

三、中性與救贖的客家敘事

黎力基在〈客家漢人〉開篇，表明將主要針對廣東地區的客家人源流、生存現狀、語言、宗教和特別的習慣展開討論。同時，他有意呼應此前西人對客家問題的關注。黎力基注意到1861年的《孖刺西報》（*Daily Press of Hongkong*）雖然已刊發過與客家相關的文章，但當下讀者已經沒有機會閱讀。此後，歐德理也曾在《中日記錄與見聞》（*Notes and Queries*）發表系列文章，討論客家問題。但該雜誌發行量有限，讀者也難有渠道獲得相關論文。這裡指的應該就是歐德理分六期發表的〈客家漢民族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Hakkas Chinese*）一文。黎力基於1878年發表〈客家漢人〉，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西人的客家研究，有利於公眾的獲取。

24 施拉德：《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頁116。

黎力基在具體討論中，雖然也借助族譜，但與歐德理從整體上討論客家源流問題不同。他分別討論了李、洪、陳、賴、羅、何、江等家族的遷移過程，發現不同姓氏的遷移路徑存在差異。例如洪姓家族最初居住在陝西，先後遷移到四川、江蘇、福建，最後到廣東嘉應州。陳姓自稱已在福建汀州府居住二十一代，之後遷移至廣東，先後在長樂和新安定居。²⁵ 通過分析幾大家族的遷移路線，黎力基認為整體而言客家祖先來自中國北方；同時，經常性遷移也證實了客家人作為“外來者”（stranger）或者“移民者”（settlers）的身份。

在討論客家的歷史源流之後，黎力基結合自己在客家地區傳教的經歷，對其語言、信仰、生計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討論，且有意識地將客家人與周邊漢人做出對比，凸顯客家人的獨特性。在信仰方面，雖然與漢人相似，客家人有祖先崇拜，信奉佛、道及各種民間神祇，但“整體而言，客家人不似本地人那樣頑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²⁶ 太平天國起源於客家人群，也說明他們對於新的信仰較為開放。²⁷ 黎力基還發現與客家人交朋友，也相對容易。對此，他沒有簡單地從文化層面歸因，而是挖掘更深層次的社會因素，認為主要是由於客家人長期處於對漢人的恐懼之中，而更傾向對外國人展示出的善意積極回應。

黎力基關於客家人宗教信仰的論述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張力。在對客家人的宗教觀念作出總體判斷之後，他也詳細記錄了在1863年約三千客家人逃難至香港的場景——他們“對靈魂得救漠不關心，完全被眼前的災難和黑暗的未來所佔據”，“長期被徹底壓垮，使他們的心靈變得麻木與冷漠”，“雖然勉強保住了性命，卻沒有忘記把偶像裝進盒子或籃子裏帶出來”。²⁸ 可見，客家人在困境中仍忠誠於原有的信仰，這與黎力基前文所言“客家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判斷似乎不符。但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恰好構成了黎力基對客家人宗教信仰複雜性的如實記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黎力基對客家人宗教的判斷是通過比較而來，具相對性而非絕對性。他以當地人為參照，認為客家人的宗教偏見程度較低，更願意聽道。但這並不意味着客家人可以輕易拋棄傳統信仰。對外界持開放態度與堅守精神寄託，兩者並不矛盾。其次，黎力基並未批評這些客家難民，而是以“長期被壓垮”的心理原因來解釋他們的“麻木與冷漠”，因而他們攜帶基督教認為的“偶像”更多是跟從傳統的習慣性行為。這種描寫方式既不美化，也不貶低，而是一種試圖理解的務實觀察，表明黎

25 R. Lechler, “The Hakka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9, No. 5 (1878): 353–54.

26 Lechler, “The Hakka Chinese,” 358.

27 Ibid.

28 Lechler, “The Hakka Chinese,” 355–56.

力基更傾向從社會和歷史角度解釋客家人的認知與行為習慣。

黎力基也如實記錄了客家人的生存狀況，認為他們整體上比較貧窮，因此需要努力工作來維持生存。²⁹ 在肯定其勤勞刻苦的同時，他也指出了這種勞動背後迫於生計的無奈。女性不僅需要從事田間勞作，還有大量家務；嘉應州的婦女需要自己紡線製衣。可見，他一方面認可客家女性不纏足、與男性共同勞作等有別於漢人群體的特徵；另一方面也指出她們勞動負擔過重，甚至“從未有過足夠的閒暇去學習正當的女性手藝。”³⁰ 因為貧窮，多配偶的情況在客家群體中並不常見，但殺嬰行為非常普遍。這裡黎力基既沒有迴避貧窮對家庭結構的制約，也沒有忽視殺嬰這一殘酷的社會問題。從居住環境看，客家人的房子都很破舊，建築材料主要是尚未燒製好的磚塊，甚至沒有用灰泥抹好，遇到暴雨天氣就變得危險，不適宜居住。同時，黎力基注意到富有人家的是石頭建造的三層房子，還有堅固的院牆來保護屋主，與窮人的居住條件形成強烈反差。更重要的是，在黎力基看來，建造圍牆的預防方式表明客家人在整體上尚未達到較高水準。由於貪婪的官員樹立了非常糟糕的榜樣，他們通過偷竊或搶劫來尋求報復，也不足為奇。³¹ 基於此，黎力基呼籲這個民族（nation）——包括客家人和漢人——需要一場變革。這一呼籲本身既包含對客家人現實處境的同情，也包含對其問題與缺陷的批評。

黎力基〈客家漢人〉的發表介於歐德理 1873 年的研究和肯比爾 1912 年的論述之間，恰好處在太平天國運動後，傳教士對客家群體集中關注的熱潮之中。但與歐德理和畢安展開學術論爭不同，黎力基選擇了另一條路徑，更專注於將二十餘年在客家地區的傳教經歷轉化為對客家源流、語言、宗教及生存現狀的思考，並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

黎力基延續了歐德理開創的比較研究範式，又發展出更具實證性的特點。就客家學研究的開創而言，歐德理奠定了兩條研究思路，即現代民族學的比較方法和探索客家源流的進路和架構。³² 基於此，黎力基不僅對廣東省內不同族群的語言和信仰進行比較，更深入考察客家族群內部不同姓氏的遷徙路線。這種比較視野也體現在他對客家信仰的細緻分析中：既注意到客家人與漢人共用的儒家祭祀傳統和男性巫師現象，又敏銳地捕捉到“仙婆”等獨特的民間信仰。這種同中有異的書寫方式，展現了黎力基的學術自覺。

29 Lechler, “The Hakka Chinese,” 359.

30 Ibid.

31 Ibid.

32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頁 67–70。

黎力基對客家人南遷路線的重構也體現其研究的創新性。儘管在客家源流問題上，黎力基同意其他傳教士認為客家源自中原正統的觀點，也以族譜作為關鍵史料，但他更着力揭示客家族群內部遷徙的多樣性。肯比爾認為廣東十之八九的客家人在遷到福建寧化之前，祖籍地是河南（Honan）³³。與這種籠統說法不同，黎力基通過族譜資料和信徒口述，還原不同姓氏的具體遷徙軌跡。這些基於具體姓氏的微觀考察不僅揭示了客家遷徙的多元性，更從根本上動搖了簡單化的族群起源論述。這種以實證為主體的研究，在當時傳教士的客家論述中並不多見。

在文化評價方面，黎力基同樣表現出與同時代傳教士不同的立場，更注重現象背後的社會結構問題。例如，他雖然也讚嘆客家婦女的勤勞，但沒有像其他傳教士那樣止步於情感層面的肯定，也並未將其歸結為某種“種族優越”或文化本質主義的美德敘事，而是進一步揭示了其背後的社會經濟根源——迫於生存壓力的無奈選擇。出於同情，他有時更情願看到男人肩扛重物，而不是女性。³⁴ 此外，黎力基還指出客家女性不纏足的現象同樣與勞動需求密切相關——她們必須保持自然雙足以便在田間勞作、背負重物、砍柴養豬。這並非文明的優越，而是生存的必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客家人及文化的整體評價上，黎力基的文章中較少用褒貶色彩強烈的詞彙。他在〈客家漢人〉開篇提及客家人時，只是從人群分類角度將其界定為“不同的族群”（the different races），措辭相對克制而中性。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不少傳教士對客家人的書寫充滿了明顯的褒揚傾向。以肯比爾為例，他在開篇就從價值層面評價客家人：“比城市中的住民更勇敢自由，他們具備了全世界山居者愛好自由之特徵。他們每天沐浴的習慣，使得他們比對大多數的中國人更清潔。客家婦女通常身體強健，精神軒昂，在戶外生活中起着主導作用，僅僅是由於她們不纏足。”³⁵ 在回顧客家人的南遷歷史之後，肯比爾更進一步認為“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力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個民系。他們源起與漂移的境況足以說明他們為其種族和勇武精神而自豪。”³⁶ 其中“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等溢美之詞，表達出肯比爾對客家人強烈的肯定與讚美之情。這種正面形象的塑造，在當時的傳教士文獻中並非個例。與這種美化範式不同，黎力基的思考有更豐富的社會分析維度。以前文論述的客家女性問題為例，他雖也注意到其勤勞特質，卻並未將其美化為族群美德，而是揭示了貧困生存這一深層根源。同樣地，在分析客家人與外國人

33 George Campbell,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43, No. 8 (1912): 475.

34 Lechler, “The Hakka Chinese,” 359.

35 Campbell,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473. 此處譯文引自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 42–43。

36 Campbell,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480.

較為融洽的互動關係時，黎力基採取了社會結構的分析方法，指出這實際上反映了該群體長期處於華南地方社會的邊緣地位所形成的特殊生存策略：作為被排斥的“外來者”，客家人對來自外部的善意表現出更高的接納度。

在此基礎上，黎力基將自己對客家人的觀察和思考提升至對中國社會整體結構的批判層面，指出無論是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客家人，還是本地漢族群體，皆面臨着由官僚腐敗和貧富差距造成的深層困境。在他看來，這種困境並非某一族群的問題，而是晚清中國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普遍體現。作為傳教士，黎力基自然將基督教視為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潛在力量，認為宗教信仰的革新可以成為推動中國社會整體變革的重要途徑。這一論述既鮮明地體現了他的宗教立場，也真實地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深刻認識，展現出一種外來信仰與本土社會現實之間的複雜互動。

由此可見，作為長期深入客家聚居區的傳教士，黎力基既從基督教信仰的視角審視客家社會，又以相對客觀的態度記錄這個邊緣族群的文化特徵。與同時期許多為傳教目的而美化客家的論述不同，黎力基構建出一種雙重文化視角。一方面，他明確地將客家人定位為漢人的支系，避免將客家與漢人的差異本質化，而是將其理解為中華文明內部多樣性的表現；另一方面，他又從基督教普世主義出發，認為無論客家還是漢人群體都需要宗教性的改革。這種雙重立場既尊重邊緣族群文化的存在，又保持外來信仰的批判性，使其研究超越了單純的宣教模式，為理解邊緣族群與外來信仰的互動提供了生動案例，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價值的民族志文獻。

四、歷史與現實的雙面形塑

前文提及，飯島典子對鴉片戰爭之前傳教士的客家著作進行研究，發現他們對客家人並沒有特別的禮讚，也不存在什麼偏見。然而，考察十九世紀中期以降的傳教士著述，可以觀察到一個顯著的轉變，即呈現出較為鮮明的感情傾向，其中不乏對客家人的高度讚譽。這一從客觀描述到價值評價的轉變，折射出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傳教士在變動的中西方互動關係中，對客家文化認知和客家人形象進行了重構。

晚清以來，報刊、書籍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如《中國評論》《教務雜誌》等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些外文期刊主要刊登在華傳教士的文章，反映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以創辦於1867年的《教務雜誌》為例。該雜誌主要面向

傳教士本身，記錄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因此更能代表傳教士的聲音。³⁷ 1868年，該雜誌刊出一篇介紹中國人口的文章，內中提及客家人，此為該雜誌最早發表的涉及客家的作品。自1868年直至1941年停刊，《教務雜誌》保持了對客家相關情況的持續興趣。其中不可忽視的時間節點包括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以及1856年至1867年之間廣東西路發生的土客大械鬥，³⁸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西方人對於客家源流問題的更大興趣。³⁹ 傳教士對客家研究較為集中的第二個時期是二十世紀初的《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事件之後。⁴⁰ 該事件進一步引起了傳教士對客家問題的關注，如肯比爾在〈客家源流與遷移〉（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一文中論及該事件，指出漢人精英對客家人身份的誤解。⁴¹

可以說，以客家人為主要傳教對象的巴色會傳教士不僅密切關注華南地方社會的發展，更積極參與到關於客家源流的討論之中。巴色會最初並非以客家人為傳教對象，而是他們在漢人聚居區傳教受挫後，才轉入客家地區，並成功打開局面。這一特殊的傳教經歷，既使他們對客家文化有了深入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們面對日益激烈的土客矛盾時的立場。在討論客家源流問題時，畢安、黎力基和肯比爾等傳教士不約而同地主張客家人具有純正的漢族血統。他們均利用客家族譜資料和田野調查來佐證這一觀點，其論述與同時期客家本土學者的研究相互呼應。到二十世紀初，華南地區處於激烈動盪與變革之中，巴色會傳教士不僅為本土學者提供外來者視角的支持，更通過帶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構建了積極的客家族群形象，“他們對客家人稱讚有加，給予了很高評價，動輒冠以‘最衛生’‘最優秀’‘最優美’等詞彙。諸如此類的溢美之詞，日後為客家人所吸收和借用，成為自我建構族群意象的關鍵字。”⁴² 前文討論的肯比爾對客家的高度評價即是典型例證。這種緊隨時代的轉變體現出西方傳教士如何在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中，逐漸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也以特殊的外來者邊緣身份參與到近代中國族群關係的塑造過程。

然而，在上述轉變過程中，黎力基的客家書寫頗有與眾不同之處。當多數傳教士的論述或主動或被動地捲入族群話語權爭奪時，他仍能保持一定的中性描述與客

37 陶飛亞：〈傳教運動的圈內“聲音”：The 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 初論〉，載張先清主編：《史料與史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61-62。

38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40。

39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頁15。

40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頁42。關於該事件的詳細情況，可參考陳澤泓：〈愛國未有不愛鄉——試析黃節編著廣東鄉土教科書〉，《廣東史志》（1999年第2期），頁50-54。

41 Campbell,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475.

42 周建新：〈客家文化的研究歷程與理論範式〉，頁82。

觀立場。其核心目的不在於參與塑造特定群體的身份認同，而在於儘可能如實記錄客家人的真實生存狀態與文化特質，並從社會經層面進行反思和批判。這就使得黎力基的論述對二十世紀初客家精英發起的族群身份建構缺乏直接的話語效用，也未能廣泛引起當時學界和社會的關注。誠然，肯比爾的文章開創了客家研究的方法，並被國內外學者借鑑，如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一書通過族譜重構了客家五次遷移的路線，將客家描述成一個具有中原血統、在不同時期南遷的“民系”。而此類著作的出版也成功地凸顯客家人的歷史，對於客家族群的正面形塑與地位提升，有其特殊的意義。⁴³ 就國外學界而言，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所著的《種族的品性》也以肯比爾的《客家源流與遷徙》為基礎，強調“種族特性”是自然淘汰的結果，而遷徙也是優勝劣汰的篩選過程。這對於當時西方的人類學界來說，無疑是一種原創性的理論觀點，並且由於該理論適應了當時客家民系的建構需要，受到客家知識精英的歡迎。⁴⁴ 相比肯比爾對客家人的溢美之詞，黎力基的客家書寫保留了較為複雜的多面性和結構性批判。儘管在客家知識精英中的接受程度不是很高，但也正因如此，才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審視晚清華南社會更貼近歷史真實的窗口。

從更長遠的歷時脈絡來看，傳教士對客家社會的書寫既與其傳教活動密不可分，也是中西方關係的結構性變動的結果。在憑藉不平等條約取得在華傳教特權之前，許多傳教士只能通過與東南亞華人的有限接觸來認識中國。他們雖能憑藉語言、習俗等外在特征區分不同華人群體，卻未能形成系統化的認識，因此早期對客家文化的記載往往流於表面，更無從進行價值層面的評判。與此同時，工業革命推動下的西方社會經歷了深刻轉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十九世紀後半葉來華的傳教士。他們面對華南地區的居住環境、經濟生活、女性地位等現實情況時，常常流露出強烈的宗教救贖意識，並帶有文化優越感。隨着傳教活動的持續開展，傳教士對客家的認識漸趨深入。在宣教與探究等多種動機下，他們的書寫為二十世紀開始的客家身份建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傳教士筆下的客家形象日益豐富，往往承載相當正面的價值評判，另一方面，黎力基書寫中的中性與批判傾向，則為我們展示了一種另類的“他者”視角和敘事。

五、結論

黎力基在華南客家地區五十餘年的傳教經歷，呈現了一個外來信仰與地方族群

相遇的典型示例。與同時期其他傳教士的著述相比，他的研究展示出更多的中性描述。在源流考證上，儘管也藉助族譜，但他更注重不同姓氏遷徙路線的複雜性與多元性，通過細緻的方言比較和地方文獻，呈現出客家與華南其他族群的差異與關聯，從而在微觀層面解構了單一的“中原南遷”敘事。在文化評價上，他既不將客家人浪漫化為“最優秀”，也不作貶低性描述，而是歸因於社會結構。他認為客家女性的勤勞與其社會經濟壓力相關，而非抽象的種族精神。當然，基於宗教立場，他試圖將所有中國族群都納入基督教文明進步論的敘事之中。這種書寫特質的形成，源於他早年在廣府、福佬地區的傳教經歷，以及對客家社會的長期深入觀察。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客家知識精英推動族群身份建構之時，黎力基“去浪漫化”的書寫無疑缺少話語競爭力，未得到重視，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但也正因為如此，黎力基的另類書寫超越了單純的方法論爭議，不僅是對傳教士書寫多元性的重要補充，也為後人審視十九世紀華南族群關係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43 林正慧：〈華南客家形塑歷程之探究〉，頁110。

44 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頁80-81。

參考書目

書籍

- 簡宏逸編：《製作客家人：十九世紀傳教士的客家民族志》，台北：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8年。[Jian Hongyi, ed., *The Making of the Hakka: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Ethnography*. Taipei: Chengbang yinshuguan gufenyouxiangongsi, 2018.]
- 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Luo Xiangl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akkas*.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2018.]
- ：《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史》，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Luo Xianglin. *Hong Kong and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Hong Kong: Zhongguo xueshe, 1961.]
- 湯泳詩：《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9年。[Tong Wing Sze. *A Study of a South China Hakka Church: From the Basel Mission to the Hong Kong Tsung Tsin Mission*. Hong Kong: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Research Society, 2019.]
- 張先清編：《史料與史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Zhang Xianqing, ed. *Historical Sources and Historical Boundaries: Chinese Documents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7.]
- （德）施拉德著，施民澤德文譯英文，戴智民德文譯英文附錄一、二，周天和英文譯中文：《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香港：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2012年。[Schlatter, Wilhelm. *A Lone Wild Goose in the Wilderness: A Biography of Rudolf Lechler*, translated from German to English by Shi Minze (main text) and Dai Zhimin (appendices I & II),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Zhou Tianhe. Hong Kong: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Kau Yan Church, 2012.]
- （美）衛英士著，丁立隆譯：《華南客家十五年》，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7年。[Frank J. Wiens. *Fifteen Years among the Hakkas of South China*, translated by Ding Lilong. Xiamen: Xiamen daxue chubanshe, 2017.]
- （日）飯島典子著，羅鑫譯：《近代客家社會的形成：在“他稱”與“自稱”之間》，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Iijima, Noriko. *The Making of Modern Hakka Society: Between "Exonym" and "Endonym"*. Translated by Luo Xin.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2015.]
- （日）河合洋尚主編：《日本客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Kawai, Hironao, ed.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in Japanese Hakka Studie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3.]

Lutz, Jessie G., and Rolland Ray Lutz.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 with the Autobiographies of Eight Hakka Christians,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論文

- 陳澤泓：〈愛國末有不愛鄉——試析黃節編著廣東鄉土教科書〉，《廣東史志》，第2期（1999年），頁50–54。[Chen Zehong. "Patriotism Begins with Love for One's Hometown: An Analysis of Huang Jie's Compiled Guangdong Local Textbook." *Guangdong Historical Records* 2 (1999): 50–54.]
- 達昕：〈巴色會視野中的太平天國與會黨〉，《清史研究》，第5期（2020年9月），頁150–56。[Da Xi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sel Mission."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5 (2020): 150–56.]
- 簡宏逸：〈歐德理與他的傳教士民族志：客家研究的德意志起源〉，《全球客家研究》，2第7期（2016年11月），頁1–40。[Jian Hongyi. "Ernst Johann Eitel and His Missionary Ethnography: The German Origins of Hakka Studies." *Global Hakka Studies* 7 (November 2016): 1–40.]
- 林正慧：〈華南客家形塑歷程之探究〉，《全球客家研究》，第1期（2013年11月），頁57–122。[Lin Zhenghui.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Hakkas in South China." *Global Hakka Studies* 1 (November 2013): 57–122.]
- 劉中國：〈洪仁玕、韓山文與中國第一部口述回憶錄〉，《南方論叢》，第1期（2008年3月），頁77–80。[Liu Zhongguo. "Hong Rengan, Theodore Hamberg, and China's First Oral Memoir." *Southern Tribune* 1 (March 2008): 77–80.]
-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期（2014年5月），頁1–114。[Shi Tianfu. "From 'Kejia' to Hakka (Part II): The Emergence,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Designation 'Hakka·Kejia' in Eastern Guangdong." *Global Hakka Studies* 2 (May 2014): 1–114.]
- 譚樹林：〈近代來華基督教傳教士與客家源流研究——以歐德禮、畢安、肯比爾為中心〉，《學術研究》，第9期（2007年），頁39–45。[Tan Shulin. "Moder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he Study of Hakka Origins: Focusing on Ernst Johann Eitel, Charles Piton, and George Campbell." *Academic Research* 9 (2007): 39–45.]
- 王東、楊揚：〈客家研究的知識譜系——從“地方性知識”到“客家學”〉，《史

- 林》，第3期（2019年），頁117-32，頁220。[Wang Dong, and Yang Yang. "Genealogy of Knowledge of Hakka Studies: from 'Local Knowledge' to 'Hakka-ology'." *Historical Review* 3 (2019): 117-32, 220.]
- 夏遠鳴：〈試評《中國評論》中兩篇關於客家源流的文章〉，《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29卷第12期（2011年12月），頁20-23。[Xia Yuanming. "A Review of Two Articles on Hakka Origins in *The China Review*." *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9, No.12 (December 2011): 20-23.]
- 楊揚：〈從“地方性知識”到“客家學”——晚清客家研究的歷程〉，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21年。[Yang Yang. "From 'Local Knowledge' to 'Hakka-ology': The Course of Hakka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hD Di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21.]
- ：〈傳教士歐德理的客家婦女研究〉，《歷史教學問題》，第2期（2021年），頁51-57，頁162。["Missionary Ernst Johann Eitel's Research on Hakka Women."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2021): 51-57, 162.]
- 張英明、周璐：〈西方學者早期對客家與太平天國關係之研究〉，《廣東教育學院學報》，第25卷第6期（2005年12月），頁77-83。[Zhang Yingming, and Zhou Lu. "Early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kkas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Journal of Guangdong Education Institute* 25, No.6 (December 2005): 77-83.]
- 鐘清源：〈黎牧師力基行述〉，《萬國公報》，69（1893年），頁十二—十五。[Zhong Qingyuan. "A Biography of Reverend Rudolph Lechler." *The Globe Magazine* 69 (1893): 12-15.]
- 周建新：〈客家文化的研究歷程與理論範式〉，《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6期（2016年11月），頁81-85。[Zhou Jianx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s of Hakka Culture."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8, No.6 (November 2016): 81-85.]
- 莊初升：〈清末民初西洋人編寫的客家方言文獻〉，《語言研究》，第30卷第1期（2010年1月），頁94-100。[Zhuang Chusheng. "Hakka Dialect Documents Compiled by Westerner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0, No. 1 (January 2010): 94-100.]
- Campbell, George.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 *The Chinese Recorder* 43, No. 8 (1912): 473-80.
- Eitel, Ernest John. "Notes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Hong Kong, China), No. 8 (1867): 97-99.

- .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No. 3 (1873): 160-64.
- Lechler, Rudolph. "The Hakka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9, No. 5 (1878): 352-59.
- .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Basel Mission Station at Lilong, in the South of the Province of Kwangtung." *The Chinese Recorder* 8, No. 1(1877): 46-54.
- . "A Visit to Some of the Basel Mission Stations in Kwangtung Provi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7, No. 4 (1876): 276-83.
- . "A sketch of the Work of the Basel Miss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11, No. 6 (1880): 445-48.
- . "From Canton to Swatow Overland." *The Chinese Recorder* 15, No. 2 (1884): 90-100.
- Piton, Charles.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Hong Kong, China), No. 4 (1874): 222-26.

THE MARGINALIZED OTHER: RUDOLPH LECHLER AND HIS NARRATIVES ON THE HAKKA PEOPLE

ZHAO RUIJUAN*

ABSTRACT Western missionari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Hakka culture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their influence cannot be overlooked. Among the vast body of research, the writings on Hakka by Rudolf Lechler, a missionary of the Basel Mission, stand out for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On the one hand, Lechler participated in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alongside other late Qing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heriting missionary concerns about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e Ming and the Qing periods.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he documented and evaluated the Hakka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unlike most of his contemporaries who tended to “idealize” the Hakkas, Lechler adopted a particular “critical realist” stance. Although he acknowledged the common view that the Hakkas were Han descendants coming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he would understand Hakka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rough the lens of economic realities and social condition. Unfortunately, this approach means his writings were often not included in the wider discussions on the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Hakka elit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rediscovery of Lechler’s narratives reveals diverse missionary writings on the Hakka people and offers a key historical source that enables us to grasp the complex ethnic relations in late Qing China beyond any simplified binary oppositions.

KEYWORDS Rudolf Lechler, Basel Mission, Hakka, Local Society,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 **Zhao Ruijuan**
Assistant Professor (Teaching)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